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莊子譯注

□ 刘建国 顾宝田 注译



223.54

2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莊子譯注

□ 刘建国 顾宝田 注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07号

zhuāngzì yìzhù

庄子译注

刘建国 顾宝田 注译

责任编辑: 李本达

封面设计: 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22.125印张 5插页 52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长春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装订 印数: 1—6 260册 定价: 20.00元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 7—80528—601—9/I·117

前　　言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文学家，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学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历代学者对庄子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对庄子著作的真伪，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我们也想借撰写《庄子译注》的机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庄子的生平及时代

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宋国蒙人。他做过蒙地的漆园吏，后隐居于“穷闾阨巷”，以织履糊口谋生。他不仅不与宋国的统治者合作，而且也不与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共处，楚威王曾以千金聘其为相而不受。他与惠施为友，相互切磋学问，著书立说，撰有《庄子》一书。

庄子的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体系是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代的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生产的推广。据《国语·齐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櫌，试诸壤土。”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相当发达，不仅

有鼓风用的皮囊，而且已有合金技术，《墨子》一书中就记有车具铁纂、铁什，农具有铁服（铁耜）等。战国时期，已有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韩国的棠溪等冶铁基地和铁制手工业城市。铁制工具已经普遍使用于各诸侯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农业得到深耕细作，出现了牛耕，促进了荒地森林资源的开发和水利灌溉的发展。铁制工具的使用，农牧业的发展，使手工业由官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转为豪民的私营大手工业和个体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经营，形成冶金、制陶、皮革、纺织、兵器制造等百工俱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范蠡、白圭一类的高过诸侯的工商大户，而且形成了齐国临淄、赵国邯郸、宋国定陶、秦国咸阳、卫国濮阳、楚国鄢、郢等商业城市。庄子《逍遙游》中把“陶铸”术语用于政治，《养生主》描写的刀刃之快，《人间世》、《马蹄》、《徐无鬼》诸篇中塑造的匠石的高超技术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都说明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庄子在《外物》、《让王》、《徐无鬼》等篇所涉及的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足以生活，铫鋤必须修整，除草不能卤莽，社树下可以容数千头牛蔽荫，任公子钓鱼用三千牛肚作鱼饵都反映了当时农牧产品的发展。庄子在《逍遙游》、《人间世》、《齐物论》诸篇中所描写的宋人到越国去卖帽子，不龟手的药方可价值千金，就连“支离疏者，颐隐于脐下，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人也可以“挫针治繻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反映了当时商业十分发达，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从公元前 685 年起至公元前 408 年止，在齐国、鲁国、楚国、郑国，先后实行了废公

田，“初税亩”、“定军赋”、“作丘赋”等制度；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民得买卖”，都说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在土地制度的转化过程中，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奴隶主部分转化为地主，一部分庶民或士阶层上升为新兴地主，也出现一部分巨商地主，形成为地主阶级。而多数奴隶、庶民则变为农民阶级。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呈现一种复杂而激烈的局面。既有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也有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的矛盾；既有新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有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没落的奴隶主阶层与当时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庄子》一书中反映的与当时统治者不合作的矛盾就是后一种矛盾。春秋末年的“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和鲁国的“瓜分公室”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兼并战争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奴隶和农民反抗奴隶主或新兴地主阶级斗争先秦史籍中有许多记载，而庄子的《盗跖》篇及其他篇中提到盗跖的史料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斗争。秦统一中国后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则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总爆发。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文化的进步。随着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天文学方面，有齐国甘德的《甘石星经》和魏国石申的《天文》，即后世合称的《甘石星经》，记录了星象的方位，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地理方面，有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在数学方面已能进行复杂的面积和体积的运算。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有春秋战国之际《墨子》中的力学和光学的记载。在医学方面已有分科医师的出现。《庄子》各篇中对汉河的描述，对四时、五行、阴阳的论述，对宇宙的探索都反映了当时的天文学的发展。《庄子》各篇中对南冥、北冥的推测，对四海之内山河的了解也与当时

的地理学知识齐步。他的“医门多疾”的观点和对药物“实堇”、“桔梗”、“鸡癰”、“豕零”的了解也反映了当时医学的发达。

所以，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科学文化进步，是庄子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

庄子思想是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位思想家的思想，除了有它的社会条件外，都还有它的思想渊源和先行人物，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

庄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是人所公认的。庄子哲学中道的宇宙观继承了老子道的学说在《大宗师》、《知北游》、《齐物论》、《天地》、《天道》、《秋水》诸篇中甚明。庄子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紧步老子的后尘，在其《胠箧》、《应帝王》诸篇中说得十分清楚。

庄子在批判孔、墨观点的基础上，也汲取了他们思想中的精华做为自己观点的补充。在《庄子》全书中援引孔子的言论有28处之多，竟有《寓言》中的“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得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推崇孔子的言论。在《田子方》中推尊孔子是“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的人。庄子的“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的思想则是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中汲取的营养。庄子虽然在辩论中与惠施作对，但是他也吸收了惠施的“方生方死”思想的精萃部分。所以，庄子的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是老子的思想，也间接地采纳了其他思想家的一些成果，从而构筑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庄子的思想

庄子的思想是一个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和独特思维方式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 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由以道为实体的本体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具有诡辩特点的辩证方法论所构成的。

1. 以道为实体的本体论

先秦诸子中的各派哲学家，对世界本原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道家以“道”为世界本源，并因此而得名。老子首倡“道”说，这是人们所公认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以前的哲学家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解释主要是用上帝、天命、阴阳、五行等范畴，这些范畴多属直观的朴素的不成体系的萌芽性质。虽然也有用“道”来说明自然现象的观点，但还没有提到回答世界本原的哲学最高范畴的高度。“道”为世界本原的学说是老子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世界本原的“道”又经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图式，派生出世界万物。并且认为“道”有两个特点，一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无形、无声超感觉的实体，一是有物，有象、有精在其中，两者关系是“有物”归于“无物”，“有象”归于“无象”，“有”生于“无”。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老子死后，“道”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宋钘、尹文汲取了老子“道”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成为唯物主义体系。一是庄子继承了老子“道说”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内容，并由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庄子和老子一样，也把“道”作为世界本原的。在《庄

子》中谈到庄子有关“道”说的有《大宗师》、《知北游》、《齐物论》、《天地》、《天道》、《秋水》、《庚桑楚》、《则阳》、和《天下》诸篇。关于“道”说讲得最全的是《大宗师》篇。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知北游》有“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天地》有“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都是说的“道”是“无为无形”，“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本原。他把“道”与“无”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世界就是从“无”中生出来的，因而在《知北游》中说：“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不仅道是非物，而且还是—种超时空的绝对存在的精神实体，由此可见他继承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然而，庄子并没停留在老子“道”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上，而从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庄子虽然也承认“道”是一种抽象的客观精神实体，但是他又把这种精神实体加以主观化了。因为，在他看来，“道”是主观认识的标准，“道”就是“我”，“我”等同于“道”。“道”“我”合而为一。他在《天地》中所说的：“以道观言”、“以道观分”、“以道观能”、“以道泛观”、“通于天者，道也”。在《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完成了从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过渡，把世界万物和人的精神合而为一，认为万物是主观派生的，是一种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从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到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过程，是唯心主义由粗到精的过程，也是认识史上的深化。不过这种深化总是无限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结果。

2. “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庄子的认识论也是从老子的“玄同”的认识论那里发展来的。老子本体论的“道”是其认识论的基础。所谓“玄同”指的是主观世界在“道”的绝对精神实体上达到抽象的同一。他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第五十六章）就是说只有达到“绝圣弃智”，闭目塞听，消除具体事物，才会达到真正的认识。庄子发展了老子的“玄同”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万物齐一的齐物论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庄子同老子一样，也是以“道”为其认识论的基础的，不过他的“道”已是由老子的客观绝对精神实体变成了主观精神实体。所谓“齐物”，就是以主观的绝对精神认识事物，事物则无彼此的具体差别，即“齐万物而为一”。在庄子的认识论中虽然还没有否认客观的认识对象，但是却否认了认识标准的客观性，从而对认识抱绝对怀疑的态度，所以构成了他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主义。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通过他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应帝王》、《知北游》、《秋水》、《天道》、《则阳》诸篇反映出来的，其中尤以《齐物论》和《秋水》两篇集中地阐述了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是没有质和量的规定性的。他在《齐物论》中反复强调：“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莲与楹，厉与西施，恢诡儒怪，道通为一。”就是说，事物没有大小之分，泰山与兔毛尖无大小之别；事物没有美丑之分，西施与丑厉是一样的；事物没有时间上的差别，殇子的短命与彭祖的长寿是相同的。至于大知与小知，大年与小年，大鹏与小虫也都是一样的。庄子在《秋水》中有一段关于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名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

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毫末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这段论断是在说明，从道来看，万物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从量上看，顺万物大的来看都是大的；顺小的来看万物又都是小的。从功能上看，顺万物有用来看都是有用的，顺无用角度来看又都是无用的。从取向来看，顺万物对的看都是对的，从不对的看则又都是不对的。可见，庄子完全否认了认识对象的规定性，走上了相对主义。

庄子还认为，人们的一切认识也都没有是非标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庄子不仅从相对主义出发提出事物是相对的，而且也从相对主义出发提出认识也是相对的。在他看来，世间根本没有是非的界限。他在《齐物论》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他还特别论述了是非不能断定的观点。他说，两个人辩论，你说你的观点对，我说我的观点对，无法断定谁是谁非。如果找个第三者来评是非，那么第三者站到你我任何一方也判定不了谁是谁非，第三者如果不站在你我任何一方，也更无法判定谁是谁非，所以是非是永远搞不清楚的，是非之争辩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认识就应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不去追求客观真理。

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须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庄子正是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

基础，陷入不可知论的。在庄子看来，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就认识能力来说，他把人生与认识都看成是梦幻，自以为有知的认识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他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就是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只能是一场疲劳不堪结果。在《则阳》中也曾指出过，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是广大的，事物变化无止境，我们的判断无法制定一个永恒的标准，事物是无法认识的。就知识的可靠性来说，他把知与不知、有知与无知混为一谈。在《知北游》中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在《大宗师》中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就是说，把知与不知混同起来，以大知代替小知，以不知代替所知，陷入了怀疑论的不可知主义的泥潭。

3. 谙辩论中的辩证法

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先秦认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况且还具有反对儒、墨教条的别开生面的探索性和启发性。这就是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谚辩论中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成分。诸如在《齐物论》中认为：“其形化，其心与之然”的形神关系的观点；“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的观点；在《逍遥游》中的“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的观点；在《知北游》中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的观点，全书中承认外物作为认识客体存在的观点，都是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从整体上来说是谚辩论的方法

论，但是在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对性中就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在庄子的著作中同老子一样运用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诸如：阴阳、动静、大上、上下、祸福、生死、有无、彼此、心物、始终、善恶、偏全、形神、是非、治乱、寿夭、长短、盈虚、安危、精粗、得失等。尽管在运用这些对立概念时被相对主义的观点吞没了对立的界限，但是这些对立概念的运用表明了庄子观察问题的灵活性，也是值得重视的。庄子还承认事物变化的观点。他在《逍遥游》中开宗明义地讲了鲲可以变为大鹏。这种观点在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产生之后好象很自然的，而在庄子的时代提出鲲变大鹏确是一种了不起的科学的推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则阳》中又讲了：“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明确肯定万物是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又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如此，而且庄子还认为事物是相互转化的。他在《知北游》中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正因为他承认生死的转化，所以他才接受“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观点，在他妻子死时采取了鼓盆而歌的乐观态度。庄子辩证法的无条件性使他走向诡辩论和形而上学。

（二）庄子的政治思想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特点是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和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割据的战争蜂起，政权频繁地更迭，百家争鸣的政治主张林立。这种政治状况必然反映到庄子的头脑中来。庄子的政治立场是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相对立的，庄子的政治观点是与当时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反

对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既有积极反抗精神，又有消极的出世主义态度。庄子的政治观点主要反映在他的《人间世》、《应帝王》、《胠箧》和《盜跖》诸篇之中。

1. 揭露盗者为诸侯和痛斥残暴的政治观点

庄子在他的著作中，充分地揭露了各诸侯国君的腐化无度行为。他在《则阳》中揭露卫灵公说：“夫卫灵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又说：“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他揭露了齐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谴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的行为。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的不公正现象表示极大的愤慨。

庄子对尧舜以来的统治者的残暴行为作了一一的痛斥。他在《庚桑楚》中痛斥说：“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为穴窳。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食者也！”他在《说剑》中鞭笞了赵文王杀人为乐的行为：“昔赵文王喜剑，置以士夹门，而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揭露宋王的残暴时把他比作骊龙。在《列御寇》中说：“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鼈粉矣。”他又揭露秦王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瘻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古今的政治统治作了对比，说古代的人君“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则阳》）

2. 反对争霸的战争和有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庄子是反对战争的。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不能达到至德，就在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盗跖》）当韩魏之间争霸战争烽火燃起时，庄子说：“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用子华子讲了一段劝说停止战争不废左右手的故事，说服国君停止战争。在《人间世》中，通过颜回的话说：“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量乎泽，若蕉，民其无知矣。”说明卫君好战给人民带来灾难。庄子认为，战争都是由于好名、好利引起的，他借尧进攻丛枝、胥、敖，武王伐纣的战争实例说明战争的起因是为了贪得名利地位。

在反对战争的同时，又极力反对儒家的有为政治。庄子认为，儒家所宣扬的政治观点都是有为政治。他在《盗跖》中揭露孔子说：“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在《列御寇》中借鲁哀公问颜阖“吾以仲尼为贞干，国有其瘳乎？”答说孔丘的有为政治是不可用的。尤其在《外物》中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个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借以说明儒家有为政治是唯利是图而不择手段的。

3. 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庄子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庄子既反对“君人者以己出经式法度”的法治观点，也反对“藏仁以要人”的礼治观点。他在《马蹄》中指出：“及至圣人，躇蹠为仁，蹠蹠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就是说等到圣人的出现，急急于求仁，汲汲于为义，天下才发生了迷惑；纵逸

求乐，烦琐为礼，天下才开始分离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与有为的主张相反，庄子提倡无为而治。他在《应帝王》中说：“汝游心于无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就是说，只要游心于恬淡的境界，清静无为，因顺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天下就可以治理的。他的结论是“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完全继承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在他看来，战国之世并非是“至德之世”。而最为理想的“至德之世”是回到那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原始社会。这种至德之世就是“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民”。还宣称，在这个至德之世，人们不分君子与小人，没有欲望和私念，“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这实际上是主张人人是劳动者、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虽然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幻想，或是一种倒退的消极的理想，但也给人们一种追求的憧憬和启示。

（三）庄子的伦理思想

庄子是讲人性，讲道德，讲人的价值的。但是他与孟子的性善说，与告子的性善性不善说，与后来荀子的性恶说都有所不同。庄子所主张的伦理思想是自然人性说，其伦理观点的史料主要在其《人间世》、《大宗师》、《马蹄》、《骈拇》、《秋水》、《至乐》、《庚桑楚》和《徐无鬼》诸篇之中。

“天人合一”是庄子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任何一个伦理学家在对道德作出评价时都离不开什么是人的问题，庄子也毫不例外。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物，“人与天一”（《山木》）的自然物。

人就是天，天就是人，他在《大宗师》中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这就是说自然和人是同一的。人只能因顺自然而存在，才是他所主张的“真人”。他在《徐无鬼》中说：“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在《大宗师》中也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以人助天”。这种人是自然物的天人合一说就是庄子伦理思想的基础。

庄子的自然人性论就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建构的。在庄子看来，人性就是自然本性。他在《庚桑楚》中说：“性者生之质也。”这就是说性是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的人性就是他在《齐物论》中所说的南郭子綦的“吾丧我”，在《应帝王》中所说的列子“雕琢复朴”，亦是他所提倡的婴儿状态，也就是《马蹄》中所说的“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人性就是无知无欲的自然本性。

庄子的自然人性论的内容是自然事物的属性。在庄子看来，人和物是没有区别的，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至乐》）正因为人与物无别，而人伦与果理也无分别。他说：“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知北游》）正因为果理人伦无别，所以在人的善恶的道德标准问题上，庄子主张以自然的本性作为善的内容来衡量人的品行。这就是他所说的“吾所谓藏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在庄子看来，自然无为就是人的道德标准。这样，他在道德的评价上就完全否定了人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道德的社会价值的作用，也就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实质上是否定了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的存在，走上了道德的虚无主义。

庄子追求自我养生的人生观。在道德问题上，所谓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念。人的价值不外是自我价值和社